

孙
翀 / 著

RENXINGGUAN LIANLIU—YU LIANG SHIQU RENSHENG ZHEXUE

人性觀論略

——
基于梁实秋人生哲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人性觀論

——
基于梁实秋人生哲学

孙翀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性观论略：基于梁实秋人生哲学/孙翀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7

ISBN 978-7-5660-0731-5

I. ①人… II. ①孙… III. ①梁实秋 (1903-1987) —人生哲学—研究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7267 号

人性观论略——基于梁实秋人生哲学

著 者 孙 翀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6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731-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涼風冬
有雪羨世間
事挂心頭便是
人生好時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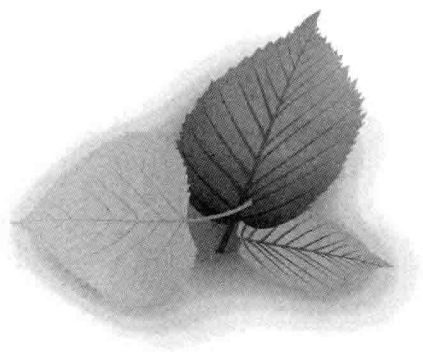
丙寅之夏可亭內閣偈

裕如先生承 梁寅秋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前 言

人性论是一切伦理的起点，一个民族的人性观，会渗透进人们的思想意识，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对本民族的道德、社会伦理起着重大影响，因此，探讨人性论，包括中西之间不同的人性观及道德伦理是有意义的。本书基于梁实秋的人性观，梳理其内蕴儒释道思想，外依西方哲学，从“兼济天下”转至“独善其身”，终达中西逢源自我实现的人生历程。作为时代非主流人物，梁实秋人性话语的出现，呈现了 20 世纪中西文化荟萃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梁实秋人性观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为圭臬，吸取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璧德“以理制欲”思想，与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包括释家体悟之说、道家淡泊无为）融为一体，以“中庸”为标尺，倡导中西文化典籍所共同表达的“理性”，指出“人性”只有在规范的伦理道德中才能实现，而文学则是“人生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于是，以“古典”、“伦理”为制高点，主张文学的根本任务是伦理的涤净，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价值的判断，判断的标准乃“常态的人性”，判断的尺度即距人类永恒的真善美中心的远近。

梁实秋这个名字是与鲁迅笔墨论争、“抗战无关论”、《雅舍小品》及历时 37 载独自译成《莎士比亚全集》四者连在一起的；尤为人称道的“雅舍”系列文集，化抽象人性为具体人性，艺术化地展现人性百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时至今日“不见替人”。

长期以来，对梁实秋人性观立场，批判的声音高于客观的认知。事实上，与其说梁实秋服膺于西方哲学理论，毋宁说他是从

与中国人有更直接血缘关系的儒家哲学出发的，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他不惜以偏离时代主潮选择“边缘”和“孤独”，坚守思想的独立，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求仁得仁，又有何怨”？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的却也是勇敢和坚忍的，值得后人回味和反思，尽管应者寥寥。

梁实秋坚持亘古不变的人性观，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人性观概念的申辩与陈说，绝非单纯学理上的论辩，实际上也是与匡世救国热忱相连的。“雅舍精神”践行了梁实秋以中为轴融西入体的价值选择和文化立场，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价值多元岁月动荡中信念的专诚和坚守。

毋庸讳言，梁实秋人性观在守护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之余显得曲高和寡；其人性观建构的文学理想，亦表现出某种绝对化的静止倾向，在强调人性普遍性的同时忽略了变异性，在兴废交替剧烈动荡的历史关头与时代精神形成抵触。这些都是必须指出的。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方法	(16)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意义	(27)
第二章 异质	(35)
第一节 “以理节情”	(36)
第二节 “精神生态”	(44)
第三节 “三境界”	(54)
第三章 同质	(65)
第一节 “自由”与“自觉”	(70)
第二节 “寻镜”与“反观”	(81)
第四章 构成	(93)
第一节 均衡	(94)
第二节 和而不同	(100)
第三节 “五四”的“他者”	(108)
第五章 “雅舍”	(121)
第一节 安时处顺	(125)
第二节 中和之道	(136)
第三节 恬于进取	(152)
第六章 结语	(161)
主要参考文献	(176)
梁实秋年谱	(179)
后记	(183)

第一章 绪论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墨子·小取》

人性，乃中外哲学关注的重要命题。事物“相灭相生、相反相成”是发展常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精神文明的每一个领域似乎都能寻觅到自己的轨迹，正如对价值的发问产生了宗教，对自识的兴趣认识了人性。人们不仅想知道真实的自己，更想知道哪些东西应予保留哪些东西应予驱逐。《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柏拉图说“哲学家才能做国王”^①。前者将文化的目的归于政治，后者认为政治的最高阶梯是文化。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即是对人类福祉或道德上幸福与快乐所寄托条件的陈述，哲学王具备最高的知识，把握绝对的善，洞悉万物的本原，克己奉公、不为利动、适时进退。洪堡（1767—1835）说：“诗和哲学是人类的思想中最高端的东西。”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明层面分为器物底层、制度中层和思想文化高层，组成无法分割的三位一体。理解是为了信念，信念是为了可以理解（奥古斯丁语），我们需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角度审视自己，这种审视不是对事件、数据层面的关注，而是要洞悉内在的规律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3页。

与魂脉。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建立了自我意识，意识到自我个体的独特存在。尽管“我”的意识仅仅是当下的那一束“知觉”（休谟语），而它却有着无穷的力量，因为人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哲学的产生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自我”意识的出现。然而，自我意识导致的远远不止于生存或生活的需要，更为隐蔽、更为深刻、更为抽象、更复杂层次的“人性”于是也就出现。人们企求在诸多问题上寻找答案：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自我与他人之间合理的关系、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自我与自然的来由与归宿、生存与死亡的意义、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及精神的出路等。人性，即一切人所具有的特性和属性问题。

人性历来众说纷纭，但人类的自识，最终将落实到一个基准。问题是无穷的，显而易见，面对多种质疑，科学是无法给出恰当的答案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人们常常用数字来衡量自己享受科学发展的物质成果，然而，在物质化的今天，文化建设仍然是民族崛起的真正途径，文化对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发展起一定制衡作用。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大脑，支配人的神经中枢。文化是最看不见的东西，也是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一如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致辞中所言：“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的确，这是一个辩证法，看起来无用的东西却最能滋养灵魂，无声胜有声，文化是人内心永远的渴求。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强国的强势奥妙在其特有的文化内核里，社会犹如生命体，文化好像生命体中的血液与水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都应是文化的崛起。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绵延的精神血脉，是形成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精神纽带，是孕育民族气质品格的精神基因。人类是文化的存在，地球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文化总是在变异和传承中向前跃迁。一切文化创造都源于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需要，一切学说都

针对社会生活这个既永恒又变动的对象而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指引精神超越的途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互通”是潜在的必然，但这又不是自然的生成过程，必须经过智慧的熔铸。因此，又可以说，哲学即是反思的学问。

文学作为人类自我观照的一种方式，虽不像哲学那样深刻简明，却有着无限的涵盖量；它远比哲学敏感，大到社会历史之沧桑，小到个人刹那间的灵魂一瞬，文学迅速及时地捕捉各种信息，并传递给哲学，再由哲学结合其他学科的养料进行综合处理，从而为人类制定最高意义上的价值标准，然后渗透并影响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

中外学术界提出，人类发展史上经历过三次重大自身界认：第一次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通过成功征服自然获得了对自身能力的确认，从而迈上脱离原始的台阶，神话与史诗便是这一确认的文学反映，在希腊悲剧、中国神话中都强调了神（自然）与人之间的斗争。第二次是人类依靠科技获得改造社会的成功，从而打破了对神灵的依赖，人类再一次认识到自身的伟大，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成了这种认识的记录。第三次便是 19 世纪以来人类在对自身精神、心理、生理等各方面有了新的科学认识后，发现自己一系列难以克服甚至不可更改的弱象，即人性的复杂。

新的自我认识打破了人类过去的狂妄与肤浅，在更接近真实的自我判认中，人类认识到必须重新确认自己。人性范畴可谓无边无际，人性归属与人性本质之辨实乃一个大题目，各种经典和论籍及注释众说纷纭。据一般规律，人之属性应是人类各种规律性行为的归纳与概括，人的行为又总是从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与自我等关系中体现出来，不是孤独的独立体，人性亦是与天性或个性密切相关的范畴。易言之，人性即站在宗教、哲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肩膀上的一种人类综合自认。无疑，人之属性应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因此，“人性”说到底是一个人类终极意义的问题。

梁实秋（1903—198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文艺理论批评家、翻译家和“五四”以来最具“中国性”的现代文学家之一。他坚持古典主义文学立场，质疑“五四”新文学，在人性认识上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界主流外的另类。本书以梁实秋人性观为依据，尝试沿着其人生哲学轨迹进行梳理抉发。



梁实秋（1903—1987）

梁实秋人性观，以儒学伦理人性为精神依归，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石，选择了向内转视角，以具有共通情感与理性的人来取代“阶级性”的人，反对阶级人性论；在“情感”与“理性”的二维之间，强调理性的支配作用，反对“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泛滥”，主张普遍性、社会性、稳定性，排斥差异性、个体性、变动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①，这是梁实秋对自己文学观的精确表述，“人性”在此成为文学活动的出发点、立足点和终止点。“人性”不仅是梁实秋文学批评的核心话语，也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基础。对于梁实秋而言，所有的文学批判与被批判，都与“人性”这个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梁实秋作为新文学阵营中的一员，何以会有悖于当时大多数新文学者的选择，而取具有古典“保守”倾向的新人文主义？对其文学批评进行科学的辨析与梳理，就有必要对梁实秋这一选择的动机和必然性做出符合历史语境的阐释。

^①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新月》第 1 卷第 1 期，1928 年 3 月 10 日。

梁实秋出身于北京一个书香气浓厚的大家庭，他的祖父梁芝山清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曾到广东做了几十年地方官，官至四品。归返北京后，在东城区的勾兰胡同买下一所庭院大宅，即后来的内务部街20号。父亲梁咸熙，是其祖父从河北大兴县领养的，19岁入北京同文馆攻习英文，毕业后在京师警察厅任职，虽受过西式教育，但一生喜爱研究小学，旁及金石之学。母亲沈舜英，杭州人，18岁嫁入梁家，生育过五子六女，梁实秋排行第四。梁家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委婉地道出了古朴的家风。这样的家庭不仅使梁实秋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也培养了他不激不随、雅健通达的个性。

1915年，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的八年生活，严格的校规并没有使梁实秋感到束缚，课余时间他积极组织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编辑，排演新



梁实秋与父亲合影

戏。他交游广泛，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曾先后邀请梁启超（1873—1929）、徐志摩（1897—1931）、周作人（1885—1967）等到学校演讲。在清华结交的同学好友均是中国现代史上各个领域的翘楚。

1923年8月，梁实秋赴美国留学，先入科罗拉多学院攻读英美文学，期间应郭沫若（1892—1978）之邀，1924年撰写了《拜伦与浪漫主义》，体现了当时的梁实秋“感性浪漫”的文艺观。1924年夏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毕业，经科罗拉多学院教务长特别推荐进哈佛大学研习。赴哈佛大学途中，在纽约与同学组织“大江

会”，倡导国家主义，振兴民族精神。1924年秋—1925年，秋梁实秋在哈佛听了一年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课，至此确立了其一生的文学信念，偏离了年少时的浪漫主义倾向，踏入节制、稳健的道路。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研习。

1926年夏，梁实秋结束学生生涯回国，先后在国内数所大学任教。第一所大学为南京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后转任上海暨南大学，同时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在上海期间，他与鲁迅（1881—1936）及左翼阵营展开学术论战，承白璧德平实稳健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开始了为建设健康的文学而奋战。论战中虽有意气之词，但总的来说，双方的文艺争鸣对于文学的本质的思考，对于阶级性与人性的探讨，对于文学的针砭和反驳等，无疑对新文学的认识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梁实秋的意见对于“五四”新文学是有意义的纠偏。期间梁实秋发表大量评论文章，分别出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1927）、《骂人的艺术》（1927）、《文学的纪律》（1928）、《白璧德与人文主义》（1929）、《偏见集》（1934）、《文艺批评论》（1934），这些文论集的出版，奠定了其古典主义的立场地位，与后来的散文《雅舍小品》，蕴着睿智，透着功力，独具风格。

在上海期间，梁实秋与胡适（1891—1962）、徐志摩等人共创新月书店，为“新月派”后期大将之一。这时的他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艺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提倡的苏俄“文艺政策”，认为“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抵制思想统一，倡导思想自由。

1930年，梁实秋离开上海任教于青岛大学（后更名为山东大学），1934年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抗战爆发后，1938年只身南下辗转入川，积极投身抗日的文艺工作中。他不仅参与

编撰了中小学教材，还负责编辑以宣传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民众读物和剧本，共赴国难的心意始终未变。1940年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团”，到前线视察慰问军民，考察当地经济、军事状况，一路风餐露宿，时有日军侵袭。有艰巨任务时，他总是主动请缨，希望在这样的实地考察工作中一方面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一方面为抗战尽一份力。抗战后期，他在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兼课，并开始创作脍炙人口的《雅舍小品》。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到北平，教书谋生。1948年冬，辗转广州，翌年6月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职。自是，梁实秋退回书斋，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晚年。

给梁实秋带来终生影响的欧文·白璧德教授，是美国思想家、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并创办了比较文学系，其影响遍及哲学、历史、政治、教育各个领域。1919年的《卢梭与浪漫主义》和1924年的《民主与领导资格》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白璧德的妻子道拉·梅·德娄（Dora May Dred）的父母曾任职于中国天津，并在上海结婚，道拉·梅·德娄出生在中国，因而“对中国有一份特殊的偏爱”^①。另有一说，白璧德的父亲生长在浙江宁波，使得他能够较多地了解到中国文化。白璧德知识渊博，通晓梵文、儒家典籍及老庄著作，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构成来看，吸收了中国儒家“克己复礼”和内照反省的观点，并把它巧妙地融入西方哲学古典主义理性节制的精神中。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认为，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是现代文明的两个车轮，前一个车轮碾死了上帝，后一个车轮鼓动人的情欲的泛滥，结果就导致了整个文明的崩溃与解体，因此，新人文主义既反对进化论，也反对由科学主

^① 见朱寿桐：《欧文·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角色》，《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义和浪漫主义衍生出的民主与平等，希望回归希腊的古典主义，以理性来节制人的情欲以挽救文明。白璧德尤提倡人类的负责精神，认为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故而在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白璧德的“人文主义”(humanism)将理想主义归入“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其思想底蕴是以卢梭(1712—1778)^①为代表的浪漫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社会一方面标榜民主、进步和人道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权力欲则在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白璧德认为浪漫主义对人的本性的“解放”就是这对矛盾的根源：“解放”一方面造就了进步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则鼓励了自我的恶性膨胀。从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两词的词源 *humanitas* 看，二者是两套相对立的“造就完善的人”的方法：以卢梭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鼓励尽可能博大的同情心和学识，通过“解放”人而获得人的完善。一个瓶子里释放出的，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从一个角度看，人道主义提倡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和社会、感官的解放和自由；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解放所造成的则可能是不加节制的迷失和混乱。相反，白璧德“人文主义”认为世界主义的博大是无法达到的虚幻，人应该通过不断的训练、挑选、砥砺与改良等“约束”的办法获得完善，或者在“解放”与“自我训练”两条路途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梁实秋选修了白璧德所授“英国十六世纪以来的文艺批评”，这段时间的

^①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学家。强调情感高于理智，信仰高于理性，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享受“自然”的自由和平等；道德败坏是由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是不平等的根源。主张订立契约的公民社会，反对破坏“社会契约”、“蹂躏人权”、违反“自然”的专制政体，建立“最聪明的少数人”为领导的、充分体现“共同意志”的“理想王国”。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顺应儿童本性，让其身心自由发展。主要作品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及小说《新哀绿绮思》、《爱弥儿》等，对以后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极大影响。

研习，奠定了梁实秋一生的思想基础，“亲炙未久，难窥堂奥，但是他在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梁实秋回忆说，白璧德精深的思想体系，不但让他获得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背道而驰；白璧德对梁实秋转向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深思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从此，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来了一个颠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①

20 世纪初中国留美学生中的梅光迪（1890—1945）、陈寅恪（1890—1969）、汤用彤（1893—1964）、吴宓（1894—1978）、胡先骕（1894—1968）、林语堂（1895—1976）、楼光来（1895—1960）等均为先于梁实秋的白璧德门下追随者，一同承接新人文主义学理脉流；而闻一多（1899—1946）、徐志摩则是在文学理论上和梁实秋同调。如果说学衡派偏重于思想意识，即道德方面倡导古典主义的话；那么，新月派则偏重于艺术创作，即在文学诗歌方面倡导古典主义。梅光迪、吴宓回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1922），标志着以国学为支柱的学衡派诞生，也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中的要义，是“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之间的关系平衡。这两大律令的分立，亦是现代性在 20 世纪初人类文化思想界域内所表现出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也就是说，上述留美学子负笈海外之始，首先求索的是人类生存意义“形而上”的哲学根本问题，而不是形而下的政治之类的是是非非，故而，学衡派强调中国民族的复兴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提出用中国古典的考证方法来研究西方的学术。在形式上，他们不认为有所谓新旧之分，也无中西之分，认为真正的人文主义应该相信一种普世价值，唯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格而

^① 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文学因缘》，台北：文星书店，1964 年。